

◆ 老北京的
文物三条街

古玩街琉璃厂

琉璃厂至今还有海王村，海王村如今辟为旧货市场，日益繁荣兴旺。海王村这个地名由来已久，据专家们考证，辽代已经有了这个地名，若以辽太祖神册元年（公元 916 年）计算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。

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年间（公元 1264—1295 年）在海王村开始建筑琉璃窑厂。明代自永乐四年至十九年修建北京宫殿，使用的大量琉璃瓦件，是海王村的琉璃窑厂烧制的。清代初期在此也有琉璃窑厂。琉璃窑厂在康熙三十三年奉旨交窑户自办，窑厂逐渐废除，海王村便盖起了许多小房屋，逐渐成为小街市，便叫琉璃厂这个地名了。

琉璃厂成为古玩街市则是后来的事。有的书上写，古玩业在琉璃厂是由旧货摊逐渐发展而来的；有人说，古玩行的祖师爷是吕不韦。对这两点，老古董商们坚决不同意。

在琉璃厂这个小街市，先有旧货摊，后发展成古玩铺，看来是合乎逻辑；古董商是一本万利，是跟吕不韦学来的，也有道理。老古董商却说：

吕不韦在邯郸娶豪家女，善歌舞；有娠而献于子楚，生秦始皇。《战国策》书中，有段吕不韦同其父的对话，不韦谓其父曰：“耕田之利几倍？”曰：“十倍。”“珠玉之赢几倍？”曰：“百倍。”“立主定国之赢几倍？”曰：“无数。”吕不韦不是做古董生意的，是搞政治交易的。说吕不韦是古董商的祖师爷，是骂古

董商为人做事不道德的一句话。至于世间传说，阴历年过年古玩铺供吕不韦，更是没有的事。

书中记载琉璃厂书肆的起源是先设书摊，后有书铺，古玩铺是由古玩、旧货摊发展起来，老古董商对此有异议。多年来有关古玩行的起源问题，在古董商中世代相传，有以下传说。

“燕王扫北，用富甲江南的沈万三的钱，让刘伯温修建北京城。”永乐十九年（公元 1421 年）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北京尚未建南城，琉璃厂地处京郊。乾隆中期，潘荣陛写的《帝京岁时记胜》中有“琉璃厂甸”条文：

“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，厂制：东三门，西一门，街厂里许，中有石桥。桥西北为公廨，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，即窑厂之正门也。厂内官署、作房、神祠之外，地基宏敞，树林茂密，浓荫万态，烟水一泓。度石梁而西，有土阜高数十仞，可以登临眺远。”可见明末清初时代琉璃厂尚未形成小街市的情况。

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数朝为官的江南人士，有人告老，不愿还乡，居留京城和京郊者大有人在。有的人便选择在琉璃厂附近居住，这里风景宜人，茂林颇似江南。

一些仕途隐退之士，懂诗书礼乐，善琴棋书画。他们以弹琴下棋，写字画画自娱，以文会友，住所门前挂有斋名堂号，招引同好，共磋琴曲棋技书法画艺，考据金石，鉴赏古玩字画，过着悠闲自在生活。

光绪进士、近代著名目录学家缪荃孙在他的《云自在龕随笔》中记载明末清初有位孙承泽，宅号退谷园，住在琉璃厂之南，盖有研山堂、万卷楼、岁寒堂。缪荃孙写道：“京师收藏之富，清初无逾孙退谷者；盖大内之物，经乱皆散逸民间，退谷家京师，又善赏鉴，故奇迹秘玩咸归焉。有客诣之，退谷必示数种，留坐竟日；肴蔬不过五篇，酒不过三四巡，所用皆前代

器皿，颇有古人真率之风。”孙退谷于每年冬季居岁寒堂。“岁寒堂中，杨补之画竹、赵子固水仙、王元章墨梅、吴仲圭松泉图，以八十之老，婆娑其间，名曰岁寒五友。”可见孙承泽之风趣雅兴及其悠然自得的生活。

琉璃厂附近居住着名人学者和告老不还乡的京官，引来进京赶考的举子前往拜会。

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是每隔三年，即子、卯、午、酉年，各省省城（包括京城）举行乡试，考试分三场，考中者称“举人”。乡试的次年，即丑、辰、未、戌年举行会试。会试在京师，由礼部主持，应试者为举人，亦分三场，三场试毕，考中者称“贡生”。每十二年中，北京城有八年举行乡试和会试。会试后一个月举行殿试，由朝臣进士出身者为读卷官，拟定名次呈皇帝核定，应试者为贡生。录取者分三甲：一甲限三名，赐进士及第，第一名称状元，授修撰；二、三名通称榜眼、探花，授编修。二甲均赐进士出身，第一名称传胪。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。

古都北京三年两头举行乡试、会试和殿试，外地学子不断进京赶考。赶考者穷书生居多，一旦得中，转眼改变了社会地位，光宗耀祖，名扬遐迩。落榜者，特别是远路而来的举子，则更加贫困，交通不便难以还乡。在京居住等待来年再考，一方面要谋生计，另一方面要准备应试。应试和落榜举子中不少人来琉璃厂拜会名人学者和仕途隐退之士，求其指教。

落榜举子有的开私塾馆当冬烘先生，有的代人写书信，也有卖字卖画，卖掉从家乡带的文房四宝和书籍维持生活。多年考不上者，有的从商。琉璃厂附近的延寿寺街有家王致和臭豆腐店出了名。王致和是安徽举人，康熙八年来京赶考，名落孙山而卖臭豆腐。而今东琉璃厂街上路北还挂着博古斋老字号的牌匾。老古董商讲，这家老古玩铺是道光年间一位外地落榜举

子祝锡之开的。

琉璃厂的古玩铺不是由摆摊出身的人逐渐开设而来的，而是由当地爱好文物、懂鉴赏知识的文人学者和落榜举子兴办起来的。所以，在清代，为官者进琉璃厂古玩店，有个多年传下来的习惯，见到掌柜的就要抱拳拱手，口称“年兄”（称同时登科者为年兄）。这个礼貌，到了五十年代陈伯达还继承。古玩老行家、金石家、篆刻家傅大卣同作者说：“陈伯达初次见到我时，拱手称年兄。”琉璃厂传下一句俗话，“一品官，二品客”，这客指的是古董商，也就是说官僚同古董商是宾客相待。

琉璃厂形成古玩街市是在乾隆三十七年（公元1772年）开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之时，以前虽有古玩文物交换，多属于以物易物，少量有以银两为媒介买卖古玩，不成其为古玩街市。

乾隆盛世，文风昌盛，集全国博识饱学之士参予修纂编辑《四库全书》。乾隆进士、内阁学士、书法家翁方纲在《复初斋诗集》自注中写道：

“乾隆癸巳，开四库馆，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，分三处，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，院中旧藏《永乐大典》内有摘抄成书汇编成部者为一处，各省采进民间为一处。每日清晨诸臣入院，设大厨供茶饭，午后归寓，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，详列书目，至琉璃厂书肆访之。”

琉璃厂西段的旧书业空前繁荣起来，带动了笔墨纸砚、碑帖、书画和金石等文化用具和古玩业的兴起，逐渐发展成文化街市。书中记载：“清代乾隆中期以来，上至公卿，下至士子，莫不以此地为雅游，而消遣岁月。”

传说，乾隆末期，西琉璃厂开设清秘阁和松竹斋都是文玩南纸店，既经营南纸，也销售文房四宝和字画。清秘阁还承办六部（中央行政机构中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各部的总称）衙门的呈奏用纸和文具印泥；松竹斋（光绪二十年改字号

为荣宝斋) 承办科举试卷。

那时，文玩、南纸没分开行业，碑帖和古玩也是同行。朝臣和文人雅士来琉璃厂游览，买书、买帖、买字画和印章、古墨、古砚、印泥等文人用具。

道光末年，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，经琉璃厂古董商之手，转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，金石学的研究在我国文人学士中再度兴起。当时，文人认为：习书法，镌刻，不学毛公鼎铭文者，只是登堂未入室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（公元 1899 年）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，发现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称之为“契文”“卜辞”，丰富了金石学的研究内容。引起朝臣中的文人学者搜集三代青铜器、古玉、甲骨、简牍、印章、泥封、瓦当等文物的兴趣，琉璃厂古董商成为他们搜集研究资料的助手。

清代两江总督、金石学家端方拜碑帖商李云从为师，同古董商孙秋颿（帆）结为金兰之好，在古玩行中传说多年。光绪年间，我国经学家、文字学家孙诒让写了考释甲骨文最早名著《契文举例》孙秋颿（帆）曾帮他搜集商代铜器、古玉、龟甲兽骨。罗振玉在清末任学部参事时，便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、式古斋，同黄兴甫、黄伯川、孙秋颿（帆）等古董商研讨金文和甲骨文，交换铜器铭文的拓片。古董商黄伯川亦可称之为金石学家，他编纂著述金石学的书籍上百册。

金石学的再度兴起，推动了琉璃厂古玩行业的发展，承袭了乾嘉以来讲风雅、讲朴学（即考据学）之风气，把琉璃厂古玩行同当时的学术研究联在一起。

咸丰、光绪年间，琉璃厂经潘祖荫、翁同龢、李文田、吴大澂、王懿荣等著名文官学者之提倡与推荐，文人学者逛琉璃厂成为一种风气。有的官员早朝后不回府第而去琉璃厂。一般都是前有顶马，后有跟骡，中间四人抬的轿子，从宣武门出城，

来到西琉璃厂，先进清秘阁。清秘阁门前有拴马桩和停轿空场；店铺内有专设的更换朝服的内室。官员脱下朝服换上便服，去书店，古玩铺游览。

书店、古玩铺没有做买卖的柜台，几层书架、古玩格，几间明窗净几之室，书画古玩陈列，幽静客堂，炉香茗碗，倦时可在暖床卧坐，吸烟谈心，无拘无束。官僚们下朝后愿在这样的文静舒适的店铺里，选购书籍，欣赏字画，搜集古玩文物。

每年的阴历正月初六开始至十六日，琉璃厂厂甸、火神庙，游人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达官贵人、文人学者，平时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太太、小姐，也出来逛厂甸，出没在火神庙的珠宝摊前和古玩、书铺之店堂。琉璃厂街上有王公贵族，也有平民百姓游逛。平时，那里也是在京的和进京的外地官员、文人学士游览观光和搜集文物之处。

外国人逛琉璃厂是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。侵略者恣意掠夺，抢走传世珍贵古玩文物，满载而去。有的士兵携带宝物之重，使他抬不起腿来迈步，只得将东西放在地上，才能迈过门坎！从此，我国奇珍异宝、古代文物在国外大放光彩，引来国外客商在京都成立洋行，进行古玩玉器的交易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（公元 1900 年）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琉璃厂归德国兵占领，古玩铺的古玩字画、金石陶瓷等文物，被德国兵抢走，所剩无几，庆幸的是没放火焚烧。

1900 年至 1927 年这一时期，外国人到琉璃厂买古玩字画、铜器、玉器、陶瓷、漆器、石刻、壁画、牙雕、缙丝等文物者很多。他们当中买中国古玩珠宝玉器时间最长、品物最多、档次最高的是美国的福开森和日本的山中。

福开森（John Calvin Fergwson）中文名福茂生。于 1886 年来华，1942 年在北平被日军遣送回国，居留中国五十六年。琉璃厂古董商称他为“福大人”。他担任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鉴定

委员，编著《历代著录吉金目》、《历代著录画目》和《艺术综览》等书。他以专家学者面目出现在北京文物市场上。日本山中，于光绪二十六年后在北京开设山中商会，直至抗日胜利，在北京收购古玩珠宝近半个世纪。

清末，法国驻中国第三公使魏武达，搜集中国文物出了名。古董商称他是鉴定中国古玩的专家，卸任后他在巴黎开古玩店。北京最大古董商岳彬是魏武达扶植起来而发财致富的。北洋政府时期，英国驻京文化参赞周尔经常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。

外国人来北京琉璃厂买古玩的有富豪、巨商、学者、政府官员，也有平民旅游者。民国十年前后，一位捷克人做中国军阀的军火生意，卖完军火换古玩回国。

在这个时期，琉璃厂古玩街的名声逐渐传遍世界，Antique Street 在国外叫响，来北京的外国人都要到琉璃厂游览参观。琉璃厂成为中国文物的集散地，也是鉴别文物的权威之处。

这时正是清政府垮台和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。“世事无常态，富贵非恒有”，新旧交换，皇朝倒台，皇家珍藏抵押在外国银行；贵胄世家靠变卖祖宗留下的古董文物维持生计；东陵被盗，故宫盗宝案发生，许多珍宝流入市场，招来国内外古董商客，如蜂聚猬集，以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入异国他乡，令人痛惜！

北京文物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。尔后，中国文物仍不断外流，但古玩行业逐步萧条、衰落，解放前已奄奄一息。

附：四十年代东西琉璃厂店铺名目字号排列

东琉璃厂自东向西路北：

邮政局、文古斋（原鉴古斋）古玩店、文光楼旧书铺、厂东门铁栅栏门、文宝斋墨盒铺、文昌胡同、论文斋古玩店、饷华

书局、怡文斋古玩店、宝晋斋南纸店、德元斋眼镜店、敬古斋字画店、东太平巷、古欢阁古玩店、鉴珍斋古玩店、万元斋眼镜店、施子云胡琴店（原龙云斋刻字铺）、晋华书局、振华斋古玩店、火神庙内：文兴斋乐器铺、玉华斋裱画铺、蕴古斋古玩店、彝古斋裱画铺、静华斋裱画铺、思古斋裱画铺、火神庙外右方：绮鑫古玩店（后改字号集粹山房）、兴文阁墨盒铺、锦文斋刻字铺、西太平巷、华古斋古玩店、庆云堂碑帖店、德文石印局、文德刻字铺（原彝古斋古玩店）、大观斋古玩店、戴月轩湖笔铺、成古斋古玩店、静文斋南纸店、博韞斋古玩店（后改字号宝古斋古玩店）、龙云斋刻字铺、开明书局、赏奇斋古玩店、韵珍斋古玩店、东北园、一得阁墨汁店、大德阁墨盒铺、愚得阁墨盒铺、九龙斋花炮店、虞云和湖笔铺、云松阁古玩店（后改字号怀古斋古玩店）、李记石印局、古源阁古玩店、华昌照像馆、茹古斋古玩店、天庆人参局、通古斋古玩店、和记文具社、古光阁古玩店、青莲阁湖笔铺、贺莲青湖笔铺、萃古斋古玩店、英古斋古玩店、聚龙号墨盒铺、文明胡同、论古斋古玩店、电话局后门、晋隆花炮店、清慎斋裱画铺、铸新照像馆、海王村公园内：雅韵斋古玩店、藏晖阁古玩店、永誉斋古玩店、晋秀斋古玩店、博鉴斋古玩店、大雅斋古玩店、雅鉴斋古玩店、抗希阁古玩店、海珍斋古玩店。

东琉璃厂自西向东路南：

崇文斋南纸店、直隶书局、吉珍斋古玩店、传古斋古玩店、师古斋刻竹铺、宝文斋书店、文友堂书店、文盛斋乐器铺、沙土园胡同、土地祠内：证古精舍古玩店、静寄山房古玩店、宛委山房古玩店、沙土园胡同东：自强书局（原广益书局）、豹文斋南纸店、宜古斋碑帖铺、信远斋酸梅汤、韞玉斋古玩店、胡开文湖笔铺、翰文斋旧书铺、纯古斋古玩店、余粹斋古玩店、悦古斋古玩店、姚江胡同、雅文斋古玩店（原为延清堂古玩店、清

和斋古玩店)、贞古斋古玩店、品雅斋古玩店、致宝斋古玩店、宝华斋碑帖铺、宜古斋字画铺、韵古斋古玩店、静观阁古玩店、陶庐古玩店、宝文斋墨盒铺、荣林斋刻字铺、荣禄堂 缙绅局、墨宝斋碑帖铺、鉴光阁古玩店、益古斋裱画铺、榷古斋古玩店、墨缘阁古玩店、萃文阁图章店、槐荫山房裱画店(原售旧书)、武学书馆、延古斋古玩店、老胡开文笔墨铺、博品社文具店、东南园胡同、马良正胡琴社、松蕴阁裱画铺、义元斋古琴社、李尧臣笔铺、锦章书局、懿文斋南纸店、观音阁、石妙斋碑帖铺(原文宝堂旧书铺)、鄞正泰湖笔铺、陶古斋古玩店、陈云亭碑刻铺、文宝斋墨盒铺、吉兴麻刀铺、信古斋古玩店、启元斋眼镜铺、宏远堂旧书铺、博文斋古玩店。

南新华街琉璃厂路口往南：集粹照像馆、竹实斋裱画铺、玉池山房古玩店、博雅斋古玩店、徐兰沅胡琴社。

西琉璃厂自东向西路北：

晋雅斋古玩店、尊古斋古玩店(后改字号：欣遇斋古玩店、萃珍斋古玩店)、公慎书局、宣和斋古玩店、振华斋古玩店、式古斋古玩店、荣宝斋南纸店(原松竹斋南纸店)、余古斋、淳青阁、铭珍斋古玩店、笔彩斋古玩店、松华斋南纸店、中华书局、崇古斋古玩店、懿文斋珠宝玉器铺。

西琉璃厂自西向东路南：

连阔如广告社、赏古斋古玩店、隶古斋碑帖铺、同古堂刻字铺、敦古谊、松古斋、虹光阁古玩店、清秘阁南纸店、商务印书馆、观复斋碑帖铺、访古斋、来薰阁旧书铺、邃雅斋旧书铺，开通旧书铺、德宝斋古玩店、德珍斋古玩店、文珍斋古玩店、南阳山房旧书铺。

古玩经营和商会

古玩是指可供鉴赏、研究的珍奇的玩赏之物，又多属古代器物，故称之为古玩。古玩这名词，乾隆年代开始使用，以前叫古董、骨董，乃“古铜”之转音。

古玩行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，它的货品是历史文物，可供考古研究，鉴定欣赏之用。一般平民百姓不买这路货，因价格昂贵，也不敢问津，同时有着神秘感。

爱好、珍藏古玩者，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人士和官僚、富豪、巨贾。文人学者搜集古玩，考据历史、文字等演变，研究艺术之发展，为著书立说准备实物资料；官僚人家购买耀眼发光的古玩珠宝，当作摆设，讲究金玉满堂；豪门巨富有的为了显示其富有尊贵而置古玩陈设，有的为了“浓缩”资财而买奇珍异宝收藏。买古玩者是各有所好，需求不同。

经营古玩古玩铺是分门别类，各有侧重。老古玩铺分为经营金石、陶瓷、字画、杂项四大类，以前经营古琴、古钱、碑帖、缙绅录的也属古玩行，后来成立古玩商会时分开。

有的古玩铺以经营金石为主，有的以经营字画为主，有的以经营瓷器为主，一般都是“一专多能”，兼营其他。以经营金石的古玩铺来说，鉴别、经营的文物有青铜器、古玉、秦砖汉瓦、浮雕造像、古陶、唐三彩等。种类繁多，举不胜举，以年代较远者居多。

青铜器又有年代品名之分。年代上有商、周、秦、汉之分，

器物上有兵器、礼器、乐器、日用杂器和生产用具之别。以礼器来说，又有簠、簋、卣、觶、鬯、尊、彝、豆、敦、爵、斝、匜、觥、角、盃、鬲、献、盘、鼎、俎、卢、壶、觚、舟、觥、栝、甗、甗、钟等等之名称。这是些古代祭礼宴享所用器皿，各种器皿有花纹、造型的不同，有无铭文之区别。整个青铜器分为“生坑”和“熟坑”。

字画、瓷器同样有年代之分、品名之别，各有各的一门专业学问。古代有欣赏价值的器物，古玩行业都要鉴别经营，自然形成各家古玩铺不同经营的分工。

琉璃厂有不少家古玩铺的经营方式，对外营业是“等主候客”，行内交易是在古玩商会的窜货场；也有串宅门走大户的，去大饭店做外国人生意的，还有做同行生意的。做这路生意不用开门市，提个包就可以做。

古玩同行人可以相互搂货，即拿来对方的货为之代销。不论这件古玩值多少钱，凡是同行人来搂货，只要双方同意，不用写收条或字据，只管拿走。没听说谁搂了货不认帐的，双方恪守信用，形成行业中的一个传统规矩。有了这一行规，才出现“包袱斋”。

古董商如自己没钱而有眼力，遇上财东出钱，可领来开古玩铺，起个字号叫什么什么斋；有人遇不上财东或不想领东去当掌柜的，自己的本钱又不多，便开个“包袱斋”，即拿块蓝色布包袱皮，到各家古玩铺去搂货，把搂来的货卖给国内外的买主或卖给同行，则可从中赚钱得利。北京最大古董商岳彬，就是从“包袱斋”发家的。

古玩买卖之间，也有中介人“跑合拉纤的”。成交后中介人按“成三破二”（即买方出成交额的3%卖方出2%）取佣钱。光绪年间，上海最大古董商金才宝是从“跑合拉纤”发展起来的。

“伙货”，两位古董商或更多的人买卖一件古玩，称之为伙

货。买货时，伙货人过目议价合作购买，也有人不看货，说一声“这货我伙啦”，便有他一股。卖货由一家出售，售价早已商定，出售后按股平分利润。有的古董商眼力差，自己单独买货没把握，便采取伙货的办法做生意。这样的古董商一般来说是消息灵通人士，得到哪里有好货的消息，便找同行一起去看法。有时自己遇到件货看不准，就找人去看，看好了便伙着买；如觉得买价太高，无利可图，可以声明不伙。古玩行有个规矩，传递信息的人，有伙货的权利。传信息的人可以声明这件货我不伙，若没声明，这货就有传信息人的一股。海王村公园大雅斋经理王幼田，抗日胜利后曾担任北平古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，这位理事长看古玩的眼力差，就是靠伙货做古董生意的。

“喀啦丸”“打眼”“砸浆”“封货”是古玩交易中的行话，有的话，譬如“喀啦丸”，现在文物业中还流行。文物界人士见一件东西，觉得没欣赏价值，看不起这件东西，就叫它“喀啦丸”。

“打眼”是说没看准被人蒙了。买了“打眼货”不但赔钱，还要“丢人现眼”。一旦打眼受骗，发现后赶紧把货锁起来，不再给人看，怕被同行当笑料说出去，有碍自己的名声。有位老古董商从太原买来件康熙豇豆红柳叶尊，拿到北京古玩商会审货场来卖，是件“打眼货”。这位老古董商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人现了眼，一气之下回了家，砸碎了柳叶尊，伤心窝火，郁悒而亡！

“砸浆”即买了打眼货或价钱买高了，伙计买的由掌柜的出面，或通过商会调解委员会出面，要求对方退货或让价叫“砸浆”。

“封货”有两种，一种是封存，另一种实际上是拍卖。不论是收藏家或同行看好了件古玩，一时讲不妥价，买方要再想一想，或找来看看。卖方主动提出，“我把货封存起来，不给

别人看了”，表示有诚意卖给对方。于是，将货包起，买主写张封条贴上，下次来时买主亲自启封。

古玩行内交易集中在同业公会（也叫古玩商会）所设的“窜货场”。同行入议价习惯用多年流传下来的“袖内拉手”方式，保密，不用嘴说出价目。遇上好货，大家都看上眼了，都去抢卖货人的袖子，用“袖内拉手”方式讲价，就行不通了，便采取封货方式；也有的好货一出台，便采用封货方式卖。

封货的方式是，卖货人写出底封，即写上要求出售的价目。然后众多的买方各自填写密封签，标明价格，签上姓名，进行投标。最后拆封唱价，出价最高者得标。公会则按成交额的千分之五收纳会费。

还有“撂跤货”、“川货”、“撬货”等行话术语。“撂跤货”是指尚未确定年份或真贋之古玩。在同行业店铺买卖货叫“川货”，也叫“川行”，有的古玩铺专做川行生意。“撬货”是当别人给了价，卖主正犹豫时，有人得到消息，添两个钱儿把东西撬来了。货的销路好，买的又便宜，也叫“俏货”；买到既便宜又好的货，叫“拣漏”，卖货的则是“漏了货”。

经营古玩者，大多数人眼力，懂鉴定，有历史、地理和文物知识，对其所售物品能讲出来龙去脉，有对答如流的口才和谦虚文雅的风度，因而受到收藏家和各界顾客的尊重和信任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古玩生意。

卖古玩向来不明码标价，只凭营业人员口头一说。老古董商回忆他们师傅说：“在老年间（即以前较远的年月），古玩买卖不说买也不说卖，买方说：‘请您把这件东西匀给我。’卖方说：‘我可以把它让给您，您拿去玩吧！’”“匀给我”、“让给您”，流传为古玩买卖行话。那年月做古玩生意不讲价还价，后来就不同了，也同买其他商品一样，买卖双方可以商讨价钱。

一般来说，买古玩的是有钱有势有学问的人多，也有自恃

高明的人。见到具体文物，则议论评介，有时他说对了，有时则是将赝品当正品来议论。若古董商当面说出真相，他就吃不消，他会说：“我看是真的就是真的，你的眼力不行。”这时，古董商再驳他，就会伤了和气，只可“顺坡下驴”，承认自己眼力不够，谢谢他帮助给“掌了眼”。有的古董商借这样的机会，就将假货当真东西卖给他。这叫被迫骗人。还有被逼作假的事。民国初，落有臣字款的字画值了钱，有的官僚、军阀限定时间叫古董商给他淘换带臣字款的字画，古董商搜集不到，便想出办法，找人给旧字画落上假款，写上“臣某某恭绘”，盖上假印章，给他送去，他看不出真假，反而很高兴。

古董商不骗人的很少，不骗人的古董商发不了财。发财的古董商有哪位没卖过假古玩？恐怕没有。

青铜器有的出土时已经破碎，经整修可复原；器物上花纹、铭文可以后刻；没有锈的可做假锈，有的可也仿制。陶瓷、字画、木雕、石刻、古玉……所有的古玩都可以仿制。后挂彩的瓷器比仿制的更难鉴别。光绪二十六年以后，文物市场上的假古玩日益增多，什么销路快，假的就多。民国十年前后，宣德炉成了快货，后来琉璃厂古玩铺差不多家家都有几件宣德炉，但大部分都不是真的。因此，经营古玩者，首先要能鉴别真假，没有好眼力很难做古玩生意。古玩经营是在“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”中大显身手，也在真假虚实的环境中锻炼出鉴定文物的人才。

附：北京古玩商会史

光绪三十二年（公元 1906 年），清政府农工商部奉旨准许京师商务总会成立，会址在西柳树井陈氏古藤花馆（即现在的晋阳饭庄）。经各行商会公举花翎四品衔候选知州冯麟霁（字润田）为总理，此人是宝兴隆金店的东家；花翎三品衔山东补用直隶州知州袁君鉴（字保三）为协理（袁是金店业人，后入交通银

行)。

光绪末年(公元 1908 年),北京古玩行人推选赵佩斋、孙秋颿(帆)、郭宝卿、穆恩禄和马子光等人筹备建立古玩商会。宣统元年(公元 1909 年),北京古玩商会正式成立,会址设在东珠市口狗尾巴胡同兴隆店内。商会成立之前,兴隆店便是古玩行人聚会的地方,那里长期居住着来自陕、豫、鲁、晋等外地的古董商(北京古董商称他们为“旅客”),他们从外地带来古玩,在兴隆店内设立的窜货场中进行行内交易。当时古玩行分为行商(即外地来的旅客)和坐商(本地有字号的古玩商号),商会要选正副会长各一名,正会长代表坐商,副会长代表行商。选出大观斋经理赵佩斋为正会长,兴隆店内德兴斋经理郭宝卿为副会长。

玉器行商会也是在宣统元年成立的。玉器行和古玩行在北京早就有,成立商会是在京师总商会成立之后,均属京师总商会会员之一。玉器行里回族人多,古玩行商会不准回民加入。而两个行业在业务上又有相通之处。

古玩行商会的名称变更:

- 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古玩行商会;
-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〇年古玩业同业公会;
-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历史艺术文物业公会(包括玉器行业和绣货行业);
-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外贸文物业公会。

古玩行商会会址的变迁。商会内设有窜货场,进行行内交易,收纳交易成交额的千分之五。因而,商会逐渐积累了一些钱,行内交易扩大,会址随之两次迁动,先搬到芦草园,后又搬到阎王庙前街,挂上了由原清廷学部侍郎宝熙书写的“北京古玩行商会”匾额。从此,外地来京卖货的古玩客商可住进商会,不收房费,因而行内的坐商与行商之分逐渐淡漠了。